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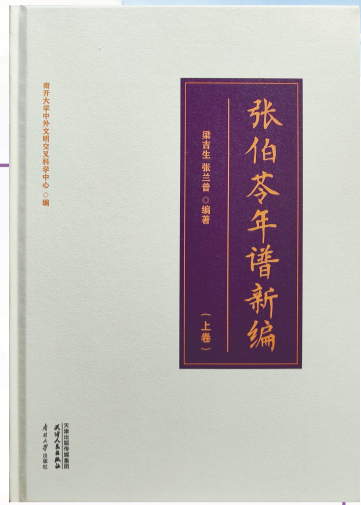


# 公允能映春秋 在年谱中遇见张伯苓

梁吉生 张兰普



《张伯苓年谱新编》(上中下),梁吉生、张兰普著,天津人民出版社、南开大学出版社 2026年3月出版。



谱主的一种评价标签。“新编”汇聚编著者二十余年积累之功,是编著者历年出版有关张伯苓资料书籍基础上的文献集成。

第三,年谱研究是以探究与构建南开校史和张伯苓教育学“实践”为基础的。“实践”是张伯苓最具活力的人生基础、基本理念和解释原则,并由此赋予年谱以特定的思想内涵、时代内涵和价值内涵,成为构建年谱问题意识、价值观念、分析框架、独特格局、学术话语的关键环节。大量以“实践”为特征的文献史料饱和式呈现与南开文化相映照,在年谱中堪作一体,从而以谱主立言立德的精神追求展现其教育学的独特风格。



## 公允能 張伯苓題

“新编”是继《张伯苓年谱长编》(以下简称“长编”)(三卷)等之后,又一部关于张伯苓生平史谱的综合性和奠基性“价值共创”,是对张伯苓教育思想研究的强力支撑,是历史接力“关键一棒”。

2009年出版的“长编”(三卷),中国著名近代史学者章开沅为该书作“序言”说:“希望这部用料真实、用功精到的年谱出版,更有助于张伯苓的研究”。

10多年之后,“新编”最为经典的一个关键词,仍然是“用料真实、用功精到”,并且有了新的特征和新的意境,更加进一步弘扬了这一学术维度。

20多年来,编著者梁吉生主持撰著并先后出版了三部关于张伯苓的年谱,除2009年的“长编”(三卷)外,还有2015年南开大学出版社《张伯苓全集》之《张伯苓年谱简编》。21世纪20年代起,在代际更替和谱学体系方面,为年谱在全新时代的赓续发展做好了充分准备,以更广阔视野结合自身张伯苓研究的经历,梳理了张伯苓年谱发展脉络和路径,精心打造成现今出版的“新编”。“新编”堪称张伯苓研究领域的集大成和指引之作。

年谱嬗变历程紧扣谱主人生主线,构建南开一张伯苓叙事框架,连环叠加,联动架构,一体运行,层层递进,符节相合,承载了时间和历史厚度,贯通文献源流、史料流变,构成了年谱背后的深厚基石。“三谱”的各谱形式在变,时间迥异,篇幅不一,但“新编”一如既往坚守文本共生、价值共通的核心逻辑,积极以自主化、谱学化的概念范畴、学理方法,在续写中迈向新境界,逐步形成相互促进的“叠加效应”,丰富了年谱叙事的实践主体,更实现了年谱记忆的时代传递。从“三谱”的前后相继,可以窥见年谱写作与时代的关系。

“新编”是兼具文献价值与情感温度的成果。它以谱主人生轨迹为脉络,丈量逝去的时光,穿越回那艰难动荡却熠熠生辉的岁月,在碎片化的历史中,一字一句地构筑张伯苓精神的故乡,将谱主人生历程的内涵还原到原生样态,绘制张伯苓那个时代生生不息的影响力图谱。这种全景式展现的谱主人生经历,是以年代史视角构建张伯苓思想体系的有分量的著作。“新编”在以前年谱实践基础上,既有相当的复杂性,互涉互渗,可感可触,共同体现深刻的历史洞察和人性关怀,又有谱型变换和自己的独特性,自成一统,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更加丰富、更加严谨,始终追寻并诠释着年谱研究的深度与人文关怀的温度,既秉持着强烈的历史延续意识,又具备开阔的研究视野,系统发掘谱主生平的深层历史逻辑,彰显了谱学自信 and 学术自觉,创新“新编”特色优势,从最初年谱的“白描”叙事到如今的“探究性”范式转换,实践表明年谱并非史料单向机械“楔入”过程,而是在编研实践中不断搜寻与建构的动态过程,从而推动年谱迈上新台阶,为张伯苓谱学树立了新的范本,也为提升张伯苓整体研究学术话语权与叙事主体性开辟新路径。

年谱代表着一种属于谱主的价值共识,更代表着年谱共性价值的追求。这部著作是经过了几十年无时或已、感蒙致志的构想与实践的,正如古人对联所言:“读书众壑归沧海,下笔微云起泰山”。这是编著者一贯的价值坚守。1984年,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以梁吉生为主编辑的《张伯苓教育言论选集》时,梁吉生突破“信息茧房”率先为该书附录“张伯苓大事记”。于是有关张伯苓年谱意念的最初萌动和构想从此产生。我们相信,教育家真精神沉潜充盈在他一生的作为当中,于是打开张伯苓命运的闸门,侧足历史,蹑迹追踪,解读教育文化遗产密码,打捞被淹没的历史细节,展望他过往人生轨迹的颠簸、曲折,还原尘封的史实篇章。最初的年谱像翻开了一页无法回头的空白篇章。基于田野调查,梁吉生与张兰普合作,重返张伯苓及南开历史现场,以新的价值追求和责任担当,从地域、圈层、角色、关系四重视野,注入强劲的搜索动能,拉满密度,层层递进,多维赋能,奠定坚韧向上的基调,展现了多年深耕的初心,依托大量档案文献和海内外存文,打捞历史碎片。重视跨学科研究范式,联动图书馆、档案馆、文博、学校、媒体、口述史,融汇史学、档案学、新闻学、社会学、以及时人记述,甚至突破地域限制打捞谱主全方位记忆,远赴美国、加拿大追踪谱主海外踪迹,对年谱作了扎实细致的勘察,既强调谱主文存与社会遗存的互证,又注重微观叙事分析与宏观背景的契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哪里有年谱的期待和诉求,哪里就有我们的身影和我们架起的主体的、多元的年谱体系。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斑斓多彩的学术痕迹,更是对生命意义的诚挚交流。谱主曾经的人生遗存,像一扇半开的门,背后藏着无尽的、私人的宇宙:纷繁的故物,潜隐的文脉,历史的场景,家国的精神,一一拨开迷雾,还原真实,提供了全新视野。年谱,是我们几十年的心路历程。撰著“新编”,是我们这些年最有价值的行动之一。我们唯一的安慰就是行走在南开一张伯苓之间而永不忘记自己的“文化本位”。

“新编”标志着张伯苓研究的代际跃迁,是学术研究和文化需求双重赋能的结果。今天,当“新编”走进公共文化空间,这不仅是一次历史回望,是南开和张伯苓教育精神的生动表达,也是编著者“学术落地”理念的生动实践,将教育家尘封的历史,转化为可传承、可传播、可感知的教育文化资源,这是为一所学校、一座城市、一段历史寻找教育文化根脉,重建精神坐标。

张伯苓是中国现代教育的重要奠基者,著名爱国教育家、杰出体育家和影响广泛的社会活动家,是清末民国时期兼具民族立场与现代视野的教育先行者和改革者,为现代学校教育奠定了新的基础,更以开放包容中西汇通助力中国教育走向现代化发展。作为在转型社会中站在潮头的先驱人物,不仅创建了第一个以新学为范式的民办教育基地——南开学校,成为近代中国探索本土化办学道路的重要典范,还在抗日战争中守护教育火种,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一起创立了中国第一所合作型大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树立了中国现代化教育的样板。无论是作为一个校长还是一个大学的人,张伯苓在教育领域的创新建树,都奠定了他的历史地位。

一部用料真实、用功精到的《张伯苓年谱新编》(以下简称“新编”)于日前出版。

“新编”之“新”在于有不断发掘的新资料 and 增加的内容新维度,为学界提供了从更宏大时空尺度上审视张伯苓人生的思想链接,形成了一个年谱解释框架,一部谱主形象的思想典范;具有文献性、综合性、前沿性,既有宏观历史视野的观照,更有微观叙事的确定性,是连接张伯苓教育革新与南开系列学校创新发展的枢纽。“新编”的编纂出版,标志着张伯苓研究迈入系统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象征着校史研究与学科研究的平等对话。该年谱是张伯苓研究的一种历史定位和实践样本,为深刻理解张伯苓在中国近代教育形成过程中的先锋作用提供了思想平台,并且把历史的时空维度拉进现实,纳入更广泛的公共视野。它提醒人们不要忘记张伯苓这位一生都致力于在中国教育园地辛勤耕耘的教育大家。这是一种精神的传承,比任何财富都更加宝贵。

“新编”是集大成的传记工程,是一个跨教育、跨历史、跨世纪的学术平台。在新年谱视域下,编著者对谱主生命以理性之刀严肃解剖,在年代叙事里,织就灵魂的经纬,展现谱主那历史的天空下人性的奇迹,见证了学术继业者追溯历史人物的真实足迹。该年谱是一道“用料真实、

用功精到”的新的谱学景观。张伯苓的一生,是20世纪中国教育的一幅侧影,走出了一段横跨世纪的壮阔人生。通过对他丰富多彩人生的历程进行拆解,以其生平为经线,铺展开一幅横跨中西、贯通晚清与民国历史的教育文化图景。这是一部具有“时间连续性”的人物谱记,既是对一位教育家个人生命历程的一种学术性身份重组,也是一部见证百年中国风云的文化记忆,标志着一部以厚重历史功底和高度文化自觉为特征的谱学新作的诞生。

值此张伯苓先生诞辰150周年之际,“新编”刊世,无疑是近代著名教育家张伯苓研究史上的一件大事。

“新编”篇幅三卷,总计216万字、100余幅照片图片,关涉几百上千历史人物,征引历史文献870余种,印证了年谱研究的稳健底色和史料搜集整理过程中漫长磨合的韧性,实现了“新编”的“量的跨越”与“质的提升”。全面记录了谱主张伯苓生平事迹和献身教育的壮丽实践,完整系统反映了其教育思想的价值内涵,正确标定了张伯苓所处的历史方位,彰显了其主体性,为全面研究张伯苓和南开校史创新发展提供了鲜活样本和思想支撑。全书有三个主要特点:

第一,“新编”是以问题意识为导向的。张伯苓的爱国理念、“国帜三易”、三育并进、公能校训、“知中国,服务中国”等诸问题,贯穿了整个年谱,是接地气的哲理思考,也构成了理解“新编”的关键线索。

第二,“新编”是在教育史视野下,以史料资源求新求全为依托的。文献是张伯苓生命的原始编码,在“新编”中,文献、文本和文字等资料是年谱的发源地,是现代年谱的承重墙,是事实判断和价值基准的基本动能与精神内核。我们的年谱编纂,在张伯苓教育学范畴下,史料学的价值取向,统整策略与建构模式,一直处在张伯苓文献史料的历史延长线上,着力加强原始创新史料和关键核心资料的挖掘和搜集,充分激发史料要素的主体活力,把这视为年谱质量的压舱石和推进器,且以历史文存与历史图照双重视觉凸现

### 小柔荐书

## 书生帝王的盛世棋局

王小柔

清史研究的长河里,乾隆朝始终是一段夹杂着极致荣光与隐秘暗涌的特殊历史。它伫立在“康乾盛世”的巅峰,拓疆御土定疆域,修书编典兴文化,造就了中国古代王朝最后的繁华图景,却也在歌舞升平中,悄然埋下了吏治松弛、贪腐滋长、思想禁锢的伏笔,成为王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拐点。《朕亦一书生:乾隆时代的君臣父子》,跳出了传统清史研究以年号为纲、以政绩为脉的刻板叙事,独以“书生”二字为核心线索与独特棱镜,穿透百年历史的烟尘,勾连起一位帝王的初心蜕变与一群士人的命运沉浮。让我们得以看见盛世光环背后,君臣父子寻常下的人性微光、官场博弈与时代真相。

### 帝王的“书生”自白

雍正十三年(1735年),二十四岁的弘历从南书房的书斋一跃登上太和殿的御座,这位在翰墨书香中浸润二十载的皇子,甫一登基便抛出石破天惊的宣言:“朕亦一书生也。”这并非帝王的故作姿态,而是青年弘历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是他尚未被皇权磨平的书生意气的自然流露。在他看来,“书气”二字,尤为可贵,真正的读书人浸润典籍、通晓义理,能涵养出浩然之气,以“易直子谅之心,行宽和惠爱之政”,远胜于那些胸无点墨、只知趋炎附势的粗俗之輩,更胜那些圆滑世故、尸位素餐的官场老油条可贵千倍。

登基之初的乾隆,也确实以书生的理想主义治理天下:他驱逐宫内招摇撞骗的僧道,厘清在雍正朝蒙冤的皇叔,广开言路求贤若渴,厘正文体摒弃浮靡,将雍正朝的严苛峻急转为宽缓包容,一时间朝野上下风气为之一新,满朝文武都能感受到这位年轻帝王的书生情怀与治世雄心。然而,帝王的“书生”理想,终究抵不过现实政治的坚硬壁垒。

乾隆元年,畿辅之地连年旱旱,山东、河南亦受旱灾波及,粮食匮乏之民不聊生,朝廷遂下令查禁烧锅酿酒,试图以减少粮食消耗缓解民困。这本是体恤民生的善政,却遭到州郡尚书孙嘉淦的激烈反对。孙嘉淦素来忠直敢言,他直言禁酒令虽意在利民,实则“止宜于歉岁,而不宜于丰年”,北方百姓多以酿酒为生,强行推行只会导致小民失业、流离失所,更会催生吏役借查禁之名贪腐索贿,反倒激化社会矛盾。更令乾隆失望

的是,面对这一关乎民生的争议,六部九卿的大臣们大多缄默不语,“中朝大官老于事,诤肯感激徒娘媪”,这些大多出身书生的官员,早已在官场的打磨中失去了直言敢谏的锐气,沦为明哲保身的看客。这场持续数年的“烧锅事件”,给了年轻的乾隆沉重一击,也让他对“书生”的认知开始发生微妙转变。

在后续的执政生涯中,乾隆更是屡屡见识到,纯粹的书生气难以应对复杂的政治现实,甚至会因脱离实际而酿成祸端。这些让乾隆深刻认识到,相较于不谙世事的书生气,官员身上“一时高兴”的轻率冒进、“高兴取巧”的投机钻营、“高兴自满”的骄傲懈怠,才是为政之大忌。于是,这位曾经极力推崇“书气”的帝王,谕旨中开始频繁出现“拘于书生之见”“书生习气”“书生不识事机”等贬斥之语,其政治理念在理想与现实的反复碰撞中不断调适,逐渐从一个理想化的书生帝王,转变为一位深谙权术、取下有术的成熟统治者。

乾隆终生手不释卷,即便政务繁忙,仍坚持读写,主持编纂《四库全书》这一文化巨典,留下四万余首御制诗,其学识与才情在古代帝王中实属罕见;他对真正坚守初心、清廉正直的读书人始终保有一份尊重与期许,对王杰这样学识渊博、为官清素的大臣倚信有加,即便王杰屡屡因清贫而在办贡等事上捉襟见肘,乾隆也始终念其忠诚,体恤其不易;即便到了晚年,面对官场贪腐丛生、自己一手培养的八旗子弟屡屡犯错的局面,他仍会亲自在督办钦案时的处置失当而慨叹“朕甚愧之”,显露出发自内心的反思与愧疚。这种“毕竟是书生”的复杂特质,让乾隆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具张力的帝王之一,他既有帝王的雄才大略与冷酷权术,也有读书人的细腻情感与人文情怀,这份矛盾交织,为这个盛世王朝增添了一抹独特的人文色彩。

### 在君臣纲常中坚守与沉浮

作者通过爬梳海量的档案文献、书信手札,将纪昀、王杰、和珅、黄景仁、洪亮吉等不同类型、不同境遇的“书生”推向台前,细腻剖析了他们在君臣父子的封建纲常下,在权力与欲望的官场漩涡中,所经历的挣扎与坚守、沉沦与升华,让我们看到盛世之下,文人阶层的百态人生。

在这群士人之中,王杰最具代表性。这位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的状元,出身寒微,无家世可倚仗,全凭学识与品行一步步走到权力中枢,一生清素自持,“素风到老如寒士,公论同声说正人”,是乾隆年间出了名的清官。丁忧期间,他意外被乾隆擢升为兵部尚书,这份逾格的恩宠让他感恩戴德却又进退两难,最终不顾眼疾之身,赶赴德州运河码头迎驾谢恩。

为了筹备觐见的“面贡”,这位清廉到无积蓄的大臣,不得不四处向亲友借贷,甚至打算卖掉京中的宅院以解燃眉之急,其在书信中写下“汪、何两年兄处屡次借债,自觉赧颜”,字字皆是清贫与无奈,读来令人感慨万千。而乾隆对这位臣子的清贫与忠诚了然于心,在接收贡品时,仅从其精心准备的物件中挑选四件价值最为低廉者赏收,其余悉数退回,这份“不以虚文相尚”的君臣相知,在进贡之风愈演愈烈、官员争相以贵重贡品钻营的乾隆朝,显得尤为珍贵。

与王杰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和珅与“高兴四人组”这类被权力与欲望腐蚀的士人。和珅通晓满、汉、蒙、梵四种文字,曾主持编纂《四库全书》,担任庶常馆总教习,从学识与履历来看,无疑是“书生”中的佼佼者。但他却将书生的才智用错了地方,凭借“高兴取巧”的钻营之术、察言观色的逢迎之能,深得乾隆宠信,一步步走上权力巅峰,却也在权力的漩涡中迷失本心,大肆贪腐聚敛,成为乾隆朝后期的巨贪,最终落得三尺白绫的下场。而黄松、国泰、荣柱、福崧组成的“高兴四人组”,皆出身八旗勋旧,是典型的官二代、官三代,凭借父辈的荫庇少年得志,身居高位。他们身上的“高兴”,各有各的模样:黄松是“无知高兴”,借着祖父黄廷桂的功勋肆意夸耀,私刻祖父奏疏博取虚名,全然不知朝廷规制;国泰是“少年高兴”,官运亨通任性骄狂,擅作威福,勒索下属,将官场视为自己的私产;荣柱、福崧则或急欲见长,或虚文粉饰,皆因“高兴”之弊屡屡触怒龙颜。最终,这四大多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国泰索贿八万余两,被乾隆赐白尽;福崧因盐政亏空受累,在赴京途中被监斩;黄松虽屡获乾隆宽宥,最终也在官场的反复浮沉中销声匿迹。这些人的命运,不仅揭示了科举入仕之外,荫庇入仕的另一条仕途路,更暴露了乾隆朝用人制度的深层弊端——过度重用八旗



《朕亦一书生:乾隆时代的君臣父子》,卜键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6年3月出版。

勋旧,却未能有效约束其行为,最终让这些世家子弟沦为权力的牺牲品。

还有一类士人,如黄景仁、洪亮吉,他们才华横溢却命运多舛,成为盛世光环下的失意者。黄景仁天资卓绝,诗名满天下,“见者以为谪仙人复出”,被时人推为“乾隆六十年间论诗者第一”,却始终久困场屋,科举不第,一生贫病交加,为了生计四处奔波,最终留下“十有九人堪白饭,百无一人是书生”的千古悲叹,病逝于西行求食的途中,年仅三十五岁。他的诗句,道尽了底层书生的辛酸与无奈,也折射出盛世之下,文人阶层的生存困境。洪亮吉虽比黄景仁稍幸运,曾得乾隆赏识,庶吉士未毕业便被钦派考差,出任贵州学政,一时“两年前尚一书生,持节今看万里行”,意气风发。但他生性孤傲,不屑与和珅等奸佞同流合污,最终得罪权贵,晋升之路被彻底堵住,即便在和珅倒台后,他因直言进谏议论朝政,仍被嘉庆帝遣发新疆。这些落魄书生的遭遇,并非个例,而是乾隆朝无数底层读书人的缩影,他们怀揣着“学而优则仕”的理想,却因家世、性格、机遇种种原因,被挡在官场大门之外,最终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让人为之惋惜。

这些不同命运的士人,如同棋子般在乾隆主导的政治棋局中各自起落,他们中有人坚守初心,成为盛世的柱石;有人迷失本心,沦为腐败的蛀虫;有人怀才不遇,成为时代的牺牲品。作者通过对这些士人命运的细腻描摹,不仅让我们看到了个体在历史洪流中的渺小与无奈,更揭示了乾隆朝政治生态的复杂与多元——这里既有君臣相知的温情,也有权力倾轧的冷酷;既有清廉自持的坚守,也有贪腐堕落的沉沦;既有盛世的繁华,也有隐藏的悲凉。

### 政治语境中的权力博弈

“高兴”一词早已脱离了其本义的愉快兴奋,成为一个内涵丰富、指向明确的政治术语,涵盖了“一时高兴”的轻率冒进、“高兴取巧”的投机钻营、“无知高兴”的好大喜功、“高兴自满”的骄傲懈怠、“高兴牟利”的贪赃枉法等多重含义。在乾隆看来,“高兴”是为官从政的大忌,是官员走向犯错甚至贪腐的开端,因此他将“高兴”二字作为训诫臣下的常用语,反复告诫文武百官“不可稍存高兴”

“勿萌高兴之念”。

如果说“高兴”是乾隆约束臣下、敲打百官的“紧箍咒”,那么“贡件”则是君臣之间情感联络与权力博弈的“润滑剂”,更是乾隆朝政治生态的直接缩影。乾隆朝的进贡之风,在历代王朝中堪称登峰造极,进贡的物品从最初的地方土特产,逐渐变为书画古玩、海外奇珍、金玉古玩;进贡的次数从新年、万寿节的一年两三次,发展到各种名目繁多的节日、庆典皆有进贡,有的官员一年进贡竟多达十次以上;进贡的规模也从“一九”为一组,发展到“三九”“四九”,甚至“九九”为一组,极尽奢华。这种愈演愈烈的进贡之风,也被论为“清代中期以后对政治腐败影响最严重的秕政”,成为官场贪腐的重要诱因。

### 理想与现实的永恒追问

乾隆登基之初,满怀着书生的理想主义,想要凭借自己的学识与能力,打造一个政治清明、民生安乐、文化昌明的盛世,想要做一位流芳千古的明君;王杰等士人坚守着儒家的道德准则与读书人的初心,想要在官场中实现修身治国的抱负,做一位清廉自持、为民请命的好官;即便是黄景仁、洪亮吉这样的底层书生,也未曾放弃对文学理想、政治理想的追求,想要凭借自己的才华赢得一席之地,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但现实往往骨感而残酷,乾隆的理想在复杂的政治斗争、庞大的官僚体系、积重难返的社会问题中不断妥协,最终不得不从理想主义的书生,转变为现实的统治者,甚至在晚年纵容和珅贪腐,留下了诸多政治遗憾。

这部著作没有刻意美化盛世的繁华,也没有片面贬斥帝王的功过,而是以客观、理性的视角,细腻、生动的笔触,还原了乾隆朝最真实的面貌:有帝王的雄才大略与内心挣扎,有士人的坚守初心与命运沉浮,有盛世的繁华荣光与隐忧暗涌,有官场的权力博弈与人性百态。他将“书生”这一关键词贯穿始终,让我们看到,无论是九五之尊的帝王,还是身处朝野的士人,无论是身居高位的大官,还是落魄底层的读书人,都难逃理想与现实的拉扯,都在各自的位置上,演绎着属于自己的人生,书写着属于自己的历史。

合卷之余,乾隆年间的朝堂风云、士林百态仍在眼前萦绕,那些帝王与士人的故事,那些理想与现实的拉扯,并未因时光的流逝而褪色,反而在岁月的沉淀中,愈发闪烁着智慧的光芒,给每一个读者以无尽的思考与启示。而“朕亦一书生”这句宣言,早已超越了时空的限制,成为每一个心怀理想、坚守本心的人的理想——无论身处何种境遇,保持一份书生的纯粹与坚守,永远珍贵。